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征文

制度型开放的理论要义与实践探索



黄先海

> 国际经贸格局正在重塑，要以开放增进合作、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有序扩大服务领域自主开放，优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范围、提升创新引领发展能级，扎实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
> ——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外贸、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论述，把握制度型开放的理论要义与实践探索，对于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准确把握制度型开放内涵要义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实践中，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内涵要义。

其一，在规则领域坚持以双向耦合为关键的高水平开放。这里更多强调的是国内国际规则的协同联动。一方面，通过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调整国内规则制度，推动国内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形成新的制度优势；另一方面，通过推动符合自身发展需求且成熟领先的国内规则上升为国际通行规则，将国内制度优势转化为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由此，以国内国际的双向互动，实现国内制度优化与国际规则塑造的有机统一。

其二，在规制领域坚持以透明可预期为基础的高水平开放。这里更多指的是透明度原则的延伸拓展，主要体现为经贸政策、监管规则、审批流程及其变动情况的及时公开，旨在保障经贸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减少乃至消除信息不对称，降低国内外经营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历史经验表明，在面对外部冲击、内部转型压力时，积极稳定的市场预期能有效避免冲击放大，增强经济韧性，并且开放程度越高，市场预期对经济稳定运行的影响就越大。

其三，在管理领域坚持以公平竞争为原则的高水平开放。这是在治理中坚持放管结合、高效协同的重要体现，重点是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依法规范政府行为，坚决防止不当干预市场竞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管理领域高水平开放的关键举措，通过“一单尽列、非禁即入”的形式明晰边界，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在清单之外领域享有平等进入权利，推动监管模式向事前定规则、事中事后强监管转变。

其四，在标准领域坚持以互认互通为特征的高水平开放。标准领域的对外开放强调国际标准“引进来”和国内标准“走出去”的协同并进，主要体现为通过标准体系的承认、衔接或兼容有效降低产品生产、服务提供等领域的交易成本。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不断细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标准化已成为提升生产效率、促进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推动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释放、创新成果进一步转化应用。可以说，标准协同互认的程度，日益决定着各国产业衔接的深度和贸易往来的广度。

深刻洞悉制度型开放机理演进

制度型开放是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拓展，开放机理也随之发生深刻变革。适应新形势、认识新特点、把握内在逻辑，才能顺势而为、精准施策。

从静态比较优势到动态竞争优势的理论演进。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下，发展中国家若完全按照静态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长期生产并出口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就可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一直处于中低附加值环节，难以实现价值链跃升，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而在制度型开放下，发展中国家可以依托体制机制创新，不断集聚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后天可获得的要素，通过发挥复合性后发优势和差异化创新优势，形成不断演进、迭代升级的动态竞争优势。基于动态竞争优势理论的制度型开放更加强调“后天获取—吸收转化—持续积累”的动态过程，与我国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高度耦合。

从边境措施向边境后措施的延伸拓展。过去，我国对外开放以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为主，聚焦削减“边境上”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当前全球经贸环境在多重冲击下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国际贸易与产业链网络出现区域化本地化收缩趋势，主要经济体在国际合作与贸易规则话语权上的竞争日趋激烈，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软联通”为基础的制度型开放日益成为国际合作的前置性条件。制度型开放注重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通相容，不仅体现为开放领域向金融、电信等非传统部门延伸，更涵盖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加大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力度等边境后措施。

从接受规则到引领规则制定的模式跃升。改革开放初期，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已经基本成型，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任务是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全面加强同多边贸易规则的对接，因此更多扮演国际经贸规则接受者的角色。近年来，多哈回合谈判长期停滞，国际经贸规则体系面临深度重构，这为我国提升国际经贸规则制定话语权提供了重要契机。实现这一目标，关键路径在于推进制度型开放，通过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在国际合作中主动参与并引领全球贸易投资新规则的制定，为完善全球治理发挥重要作用。

积极探索制度型开放有效路径

推进制度型开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对接、积极吸纳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为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以双向对接为重点，构建符合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规则体系。在这一过程中，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等方面实现规则相通相容，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主动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自贸协定提质升级。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前沿阵地，先行先试开展了一批首创性、引领性制度创新，要用好这些改革试点经验，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积极推进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更全面、更深入、更高水平的对接。

以提升贸易发展能力为重点，构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规制体系。进一步推进通关便利化，加大高素质人才引进力度，打造开放创新平台，制定实施一批体现市场友好、竞争有序、创新导向的制度规则，切实提升经营主体国际竞争力，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这些举措既有利于破除市场准入的体制机制障碍、减少资源错配、维护公平竞争，也有利于以共性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和高能级要素供给为支撑，推动产品迭代升级和外贸创新发展。在维护国家产业链、创新链安全的基础上，应坚持推动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创新政策、竞争政策协同发力，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平等获取发展机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从而强化创新驱动、提升竞争能力。

以负面清单模式为重点，完善经营主体管理机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已成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通行做法。要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在扩大竞争性领域开放的同时，推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向更多新兴领域延伸。持续完善负面清单调整、执行、评估等配套制度，进一步细化限制性措施表述，推动其更好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

以战略前沿领域为重点，提升标准制定话语权。人工智能等战略前沿领域已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重要领域，标准化既是掌握战略前沿领域话语权的重要支撑，也是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的重要体现。应加快推进我国战略前沿领域标准化工作，开展标准前瞻布局研究，推动标准化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双向赋能；促进我国数字贸易等领域的标准体系“走出去”，把各类标准“软联通”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深度参与和引领国际标准制定，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作者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大学全球发展学院院长）

激发开放与改革互促共进的乘数效应

刘江宁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是新时代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内在要求。“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不是简单增加开放事项、扩大开放领域，而是推动国内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与国际通行规则或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并主动参与乃至引领国际规则制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迫切需要实行更高水平开放，破除体制机制藩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刻认识制度型开放牵引深层次改革的时代意义，在破解现实难题中以开放倒逼改革、以制度创新激发改革动能，在更大范围激发开放与改革互促共进的乘数效应。

从锻造竞争优势看，制度型开放不是单纯扩大市场空间，而是通过引入更充分、更高水平的竞争，推动制度创新和改革深化。2025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45.47万亿元，同比增长3.8%。与贸易规模扩大相伴随的，是竞争方式和竞争条件的变化。对于企业而言，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意味着必须提高质量标准、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能力；对于产业而言，意味着必须加快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不能长期依靠低成本、低附加值参与国际竞争；对于政府而言，则意味着必须持续提高制度供给和公共服务水平，以更加稳定透明的规则环境增强经营主体发展预期。

从规则制度建设看，制度型开放的深层意义在于，以国际规则为参照推动市场经济运行规则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是规则经济，经营主体能否平等进入、要素能否顺畅流动、竞争能否公平开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规则是否统一、透明、稳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这一要求意味着不是简单照搬国际规则，而是通过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破除区域分割和制度壁垒，推动各类经营主体在更为完善的规则体系下公平竞争。由此，制度型开放不仅推动市场规则更加成熟，也促使深层次改革由单项制度调整向体制机制协同、由局部领域突破向制度体系完善不断深化。

从治理方式变革看，不同于传统要素流动型开放主要着眼于商品、资本等跨境流动，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把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纳入开放范畴，实际上是在更广阔的坐标中优化国家治理体系。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制度，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这些措施既指向准入范围的调整，又推动政府管理更多转向“定规则、强监管、优服务”，带动改革由局部性、适应性调整向系统性、深层次拓展。

当前，我国制度型开放总体推进有力，但在规则衔接、市场统一、治理创新等方面仍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打通和优化的环节。比如，关键领域规则衔接仍有差距，制约开放与改革进程。从国际经贸规则发展趋势看，制度型开放正由传统的市场准入逐步向竞争政策、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边境后规则延伸。我国在一些传统领域的规则衔接已取得明显进展，但在部分新兴领域和复杂领域，国内制度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之间仍需进一步衔接磨合。又如，区域市场壁垒尚未消除，阻碍要素资源高效配置。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能否充分转化为发展优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品、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能否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合理配置。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推进，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不断完善，但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政府采购、资质认定等方面仍存在隐性门槛，跨区域经营和要素流动面临较高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这不仅削弱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成效，也影响制度型开放中规则统一、公平竞争要求的落实。再如，新兴领域治理机制尚不完善，影响风险防控能力建设。我国相关制度建设正在加快推进，但面对一些新业态的快速发展，监管标准不够明确、部门协同不够顺畅、风险识别机制不够健全，同时企业对规则的预期不够稳定，出现“想投不敢投、想干看不准”的情况。面对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与制度型开放相关的治理方式也需要随之调整，推动深层次改革在解决新问题、回应新需求中不断破题深化。

实践表明，制度型开放越向纵深推进，越需要把制度创新压力转化为改革发展内生动力，把国际规则对接、国内市场建设和安全治理贯通起来，使制度型开放成为更深层次改革的重要牵引。

一是主动全面对接高标准规则，强化制度的系统集成。推进制度型开放，关键要解决好“对接什么、如何对接、怎样转化”的问题。要把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与国内改革统筹起来，既关注规则文本，更把握规则背后的制度逻辑和运行机制。更好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开放平台的先行先试作用，以先行先试牵引深层次改革，推动开放领域制度创新向体制机制改革延伸。坚持以开放促改革，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国内制度系统性优化，建立开放规则与国内制度动态调整、衔接顺畅的制度机制。

二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要素资源跨区域流动。要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作为制度型开放向纵深推进的重要支撑，进一步清理妨碍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资质认定等行为，减少企业跨区域经营面临的隐性成本。完善跨区域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协作，推动治理从分散分割转向规则统一，既划清安全边界，又避免“一管就死”，着力破除制约要素配置的体制性障碍。

三是健全动态评估和容错机制，增强改革发展适应性和韧性。对开放举措和制度安排开展定期评估，把规则执行效果、市场反应和改革成效作为检验评估标准，及时发现制约开放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对改革探索中出现的非原则性失误，可考虑合理容错、及时纠偏；将评估结果作为调整政策、完善制度的重要依据。

四是深化涉外法治建设，推动开放与改革相衔接。眼下，制度型开放正在向纵深推进，涉外法治建设既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保障，也是驱动深层次改革的重要力量。要围绕国际经贸规则新变化，及时完善与国内深层次改革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和监管规则，并在规则转化过程中进一步理顺各种关系。通过协同推进立法、执法、司法改革，带动相关领域治理方式调整，推动涉外法治建设与国内深层次改革相互贯通、相互促进。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多维

青年学人

李先军

先进制造业是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此作出相应部署。在实践中，如何把握先进制造业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系，如何突出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谈到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先进制造业的规模和技术优势。这固然抓住了先进制造业的鲜明特征，却还不足以揭示其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关键作用。事实上，要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先进制造业必须在规模和技术优势基础上，发挥带动和保障作用，系统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

现代化产业体系离不开先进制造业的规模优势和物质生产能力。现代化产业体系首先是完整的产业体系。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不可能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就难以创造丰裕的物质财富；没有大规模的先进制造业，就难以形成高水平的物质生产能力和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现代化产业体系高度依赖先进制造业的技术优势和制造能力支撑。现代农业、建筑业、采矿业等都需要先进制造业为其提供技术装备。从一定意义上说，先进制造业的技术优势决定着现代化产业体系能够达到的技术高度，先进制造业的制造能力决定着先进技术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二者共同决定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先进性水平和竞争实力。

现代化产业体系还需要先进制造业强大的产业关联效应和网络带动能力。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是各类产业的简单集合，而是不同产业通过投入产出、技术协作、价值创造和市场交换形成的复杂网络和有机整体。先进制造业通过广泛的产业关联、技术融合和网络组织，能够把不同产业连接起来，把分散的生产活动组织起来，把单个企业的技术进步转化为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创新，把其自身发展优势转化为产业体系的整体竞争优势。

此外，现代化产业体系也是安全可靠、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国际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先进制造业不仅能够保障关键技术、核心产品和重大装备自主可控，更能够依托完整的制造能力和产业配套体系，增强整个产业体系抵御风险、稳定运行和自主发展的能力。

总体上看，先进制造业的规模优势影响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完整性，技术优势和关联效应影响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先进性，产业韧性影响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安全性，这也是先进制造业骨干地位的具体表现。面对科技变革的新机遇和国际竞争的新挑战，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抢抓发展机遇，拓展先进制造业发展空间。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智技术蓬勃发展，不断突破制造业的技术和能力边界，这既是巩固现有制造业规模优势的重要条件，又是改变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的重要机遇。要积极运用数智技术改造现有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催生新的产品、产业和生产方式，持续拓展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推动人工智能由单点应用向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和产品服务全流程渗透，加强工业大模型、工业智能体、工业软件与工业控制系统的融合创新，培育一批智能工厂和具有产业链协同能力的智能制造平台。加快培育智能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等，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支柱产业。拓展智能制造场景，提出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加快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推动制造业发展模式和生产方式创新。

瞄准高端自主，强化先进制造业能力体系建设。随着全球科技竞争向产业链深度延伸，先进制造业的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底层技术、系统集成和产业生态组织的综合能力较量，必须把高端自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强化产业基础能力建设看，要更加重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加快突破一批重大基础技术、工艺和产品，加强共性技术研发平台、试验验证设施建设，为制造业企业提供全链条的公共技术支撑。从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看，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重大工程为牵引，建立龙头企业牵头、高校科研院所和专业化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同攻关机制。从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看，要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将科技创新转化为先进制造能力。从强化产业生态组织能力看，要形成大企业引领、中小企业协作、创新主体共同参与的先进制造业发展生态。此外，还要加快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引导耐心资本更多投向硬科技领域，不断提升关键环节自主可控能力。

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塑造先进制造业竞争新优势。绿色低碳是先进制造业生产方式先进性的重要体现，也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突破能源环境约束、赢得全球产业竞争主动权的必然要求。要强化绿色设计与科技创新，从源头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能源资源消耗与碳排放。发展绿色制造，推动工艺和技术革新，提升生产全过程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发挥先进制造业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支持上下游企业联合开展工艺改造，实现产业链协同降碳。

深化融合发展，带动千行百业共同跃升。先进制造业发展必须充分发挥技术引领、产业关联和网络组织作用，把自身发展优势转化为整个产业体系的综合优势。要突破就制造业发展制造业的传统思维，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推进先进制造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使先进制造业成为推动千行百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比如，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推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现代物流、科技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入制造过程，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深化先进制造业与农业、能源、交通等领域融合，推动先进装备、先进材料、智能技术和绿色制造技术向其他领域广泛渗透，带动千行百业的生产率跃升；统筹产业集群建设与区域发展，促进上下游企业、科研机构和应用主体深度协同，发挥先进制造业集群的组织带动和辐射引领作用，完善制造业区域联动与合作共建机制，实现产业体系整体竞争力提升。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版编辑 欧阳优 美 编 倪梦婷